

纸短情长见家风

□ 文德科

家书，是联结家庭情感的纽带，是映照家风建设的明镜。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书，不仅仅是沟通信息的工具，更蕴藏着理想、教诲和关爱。笔者阅读红色家书，深深地被革命先辈家书中展现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认真品读，纸短情长，风骨涵养，尽在其中。

真挚质朴的慈爱柔情

红色家书中有牵挂，有关怀。一封封书信，体现了革命者对亲人的关切和挂怀，绵绵情意跃然纸上。

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几经周转，从北京赶回湖南，接母亲到长沙治病。他写信给舅父文正兴、文正堂说：“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千山万水，也阻挡不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和爱。百善孝为先，孝道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一封家书，笔墨间流淌出对母亲深深的敬爱 and 惦念。

不少老一辈革命者一生戎马倥偬，与亲人聚少离多。不过，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们也时常惦记着家人。陈毅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多温习功课，注意锻炼身体。珊珊要听妈妈的话，丹淮要注意增加体重。你们要劝妈妈多休息，她看书太劳累了……”点滴之间，体贴入微。质朴无华的语言，深切的叮咛，寄托着陈毅对妻子儿女的关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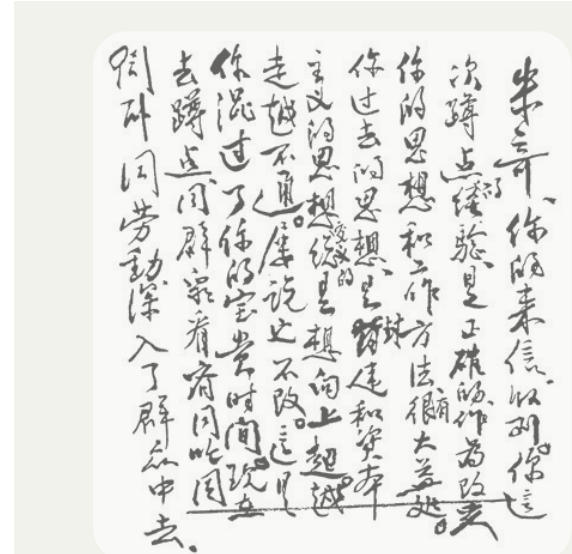
1982年元旦，彭真和妻子写给孙女小妮一封信，鼓励她养成好习惯，努力做到“三好”：“今天是一九八二年的元旦，我们祝你新年快乐进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面对亲人，铁骨铮铮的革命者也尽显柔情。

红色家书流露出的亲情是那么真实。革命者对家人们饱含真挚的爱，温暖的家庭滋养着内心善良的种子，给予他们力量，最终转化成追求真理、奔向光明的动力。

春风化雨的谆谆教诲

红色家书中有教育，有勉励。一封封书信，承载着革命先辈对晚辈的教导和鼓励，谆谆教诲感人肺腑。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195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留学期间曾有悲观的情绪。他在信中劝勉儿子说：“在你的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必须力求转变，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在信中，刘少奇还教导儿子要主动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写道：“你必须了解，每一个人



朱德写给儿子朱琦的家书



彭真写给孙女小妮的家书

都不应当躲避党和人民的监督，而应当主动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放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女儿叶楚梅在苏联莫斯科财经学院求学时，叶剑英教导她要在读书时就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谢觉哉1951年1月写信给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为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他在信中说：“那想依靠个人比如说依靠我，现在家里还有人是这样想，那是错的。”

革命先辈对晚生后辈的教导、期望和鼓励在家书中清晰可见。任弼时写信给女儿任远芳说“望你更加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徐特立写信鼓励女儿徐静涵说“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朱德写信教导儿子朱琦说“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等等。纸上的语言充满温情，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

坚定不移的理想志向

俗话说：“不怕路长，就怕志短”，家风建设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后辈做一个有理想的人。红色家书中有决心，有志向。一封封书信，展现了革命者积极向上的追求，理想信念令人动容。

王若飞在给舅父黄齐生的一封信中写道：“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未有寸报……我之读宗教书籍，只是为知道当时及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怎样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我们的哲学，是认

为一切东西都是在流动变化着。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他在信中一方面感恩舅父，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批评其错误认识。家书不仅仅传递情感，更有思想的交流，纠正家庭成员的错误认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革命者自身信念坚定、立志改造世界的体现。

俞秀松于1920年3月给父亲俞韵琴的信中写道：“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随信附上的是俞秀松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拍摄的照片。言语间，可见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新思想、体验新生活的信心和喜悦。1923年1月，俞秀松写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决意从事军事斗争的打算，他在信中说：“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表现出打倒军阀、解救劳苦大众的崇高理想和坚强决心。

没有理想，生命会变得苍白。罗瑞卿致信女儿罗点点说“要做‘大鵬鸟’，决不做‘蓬间雀’”；罗荣桓致信女儿罗玉英说“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王稼祥致信弟弟王柳华说“做个廿世纪的新青年”……革命先辈在家书中表达理想和志向，激励自己也勉励了家人。

以身作则的高度自律

红色家书中有正气，有风骨。一封封书信，传递着革命者以身作则的正派。

罗荣桓在1949年12月给女儿罗玉英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在信中，罗荣桓以自身作表率，让女儿罗玉英

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杨开智是杨开慧的长兄，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或是推荐他在湖南省从事更好的工作。毛泽东回信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告诫他要坚持原则，不要搞特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给姐姐刘绍懿写信，向她解释新中国土改政策，信中说：“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刘少奇在信中还劝姐姐：“你们不要来我这里……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他劝诫姐姐落实政策，按政府法令办事。

革命先辈以身作则、自我约束，带头廉洁治家。何叔衡曾致信义子何新九“我的人生观，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陈毅致信哥哥陈孟熙“要想办法，自力更生节约，千万千万告诫家中人等”；吴玉章致信侄子林宇“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等等。革命先辈始终保持作风正派，给家属树立了好榜样。

红色家书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心路情怀，同时也能让人对照检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注重家风建设，以身作则，管好家人、育好家风，才能更好地投身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始终做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

（摘自2024年4月1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日前，在成都发现了一封钱锺书的书信，勾起了1985年钱锺书先生接待港大学生的一段往事。收信人、港大学生文灼非给笔者讲述了这封书信背后的故事，颇能印证钱锺书与香港文学界的关系。

1985年7月间，港大学生文灼非参加了港大前瞻北访教育交流团，得以拜访钱锺书先生。

拜访时间是7月25日晚7点半，但文灼非和另外两个慕名前往的同道到钱寓已是超过晚8时了。虽然迟到，但钱锺书很体谅他们舟车辗转的不易，杨绛先生更是送上西瓜解暑。

一番寒暄之后，文灼非便请教了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钱锺书十分健谈，“他强调念中国文学要兼涉外国语言，特别要学好一种外语，再了解其文学，透过比较，会对本国的文学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这是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深研力取的一贯立场，他认为，港大学生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厚，应好好掌握利用。

同时，钱锺书还强调，要尽量多读文学作品的原文，直接与作者沟通。文灼非提问，读这种原文是否需要读点文学理论作为补充。钱锺书认为，文学理论是要学，但必须多读原文后再看，否则很容易被困于条框之内，视野不够广阔，分析能力亦会受到影响。

不知不觉就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钱寓前，文灼非一行准备了一些宣纸，想请钱锺书题几句金玉良言。钱锺书给三人题了一首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律诗旧作《寻诗》，“是讲创作意念的问题”。三人满意而归。

回港后，文灼非将这段北上拜访钱锺书的掌故写成《南沙沟里觅高人——拜访钱锺书教授》一文，发表在1985年的《友文》杂志上。在写给钱锺书的信中，文灼非除寄赠这期刊有他文章的杂志外，主要目的是力邀钱锺书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一职。钱锺书回信，在谈了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之后，婉拒了文灼非的请求——

灼非兄见：一周前由李国强先生寄来《友文》，读到大作，不胜惭愧！“沙沟”里是蚯蚓托身之所，哪里会有“人”，遑论“高”乎？事忙未能写信道谢，正在纳闷，又奉大函，并惠寄刊物。从此自存一册之外，可以把一册流通寄给人去看，为贵刊宣传，也为自我宣传，一举两得！

我对贵会，当然赞成。但“名誉会长”的名义，坚决谢绝。我在国内，不参加一切学会，不挂名借光，今年，“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比较文学会”请我充“名誉会长”，我都拒绝。前几年，同类的事已有五六起。我在国内不肯挂名，而在香港挂名，要引起误会的。务请原谅。匆复此函，即颂安。

钱锺书上，十七日夜。
钱锺书在回信中婉拒所请，理由在情在理，文灼非只好作罢。此后，

钱锺书先生的一封信

□ 庞惊涛

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20余年里，他投身新闻业，创办了《灼见名家》传媒，并出任社长。

文灼非舍文学而就新闻，虽然还在一个大的系统之内，但这样的人生选择一旦形成，人生的际遇和成就便当然会有巨大不同。2023年中，文灼非来到成都，讲起这段拜访钱锺书以及随后的交往时，仍然心驰神往，音声难忘。

钱锺书虽然婉拒了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的邀请，但他和香港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还是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抗战期间，钱锺书先生曾在香港居停过一个晚上——1938年9月11日，钱锺书偕妻子杨绛和女儿钱瑗由法国马赛启程回国，于10月12日抵达香港，次日上午9点乘太古洋行的客轮“四川”号前往安南（今越南），并于10月15日上午抵达海防；10月16日晨，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海防启程赴云南，入职西南联大。不知他到香港码头的时间是10月12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时间短暂、拖家带口，又无本港亲友关照，加之时处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他大约是没有心情去香港街头走一走看一看的，所以在钱锺书的著作里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一夜居停香港的诗文。但对香港的惊鸿一瞥，却让他从此对香港及后来交往的香港朋友保持了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摘自2024年1月26日《人民政协报》）



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的赤城县邮政局旧址

方面军驻在红安县七里坪，红安县邮政局就设在这里。新集市是鄂豫皖省府所在地。这封信的传递路线大致是从湖北红安寄出经河南新县和赤城县邮政局收转，最终送到卢炳银的家乡。由此可见，当时鄂豫皖苏区的红色邮政机构健全、制度严格、手续完备、运行通畅，一名普通战士的家书都能够横跨三省及时送达。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革命战争年代，形势十分严峻，红军留下的文物不多，红军战士的家书更是罕见。卢炳银的这两封家书，见证了红色邮政事业的发展历史，展现了红军

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对我们深入研究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乃至鄂豫皖苏区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2024年4月11日《中国国防报》）

『人在信在，完成任务』

——红军时期的赤城县邮政局

□ 胡遵远 王凤霞 王之龙

在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有一座建于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徐氏祠。90多年前，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赤城县邮政局。自此，邮局担负起发行报刊、邮寄信件、传递文件的任务，众多邮递员用忠诚和鲜血，为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29年5月，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金寨西部地区领导发动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

至1930年初，汤家汇已是商城县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在此背景下，商城县邮政局应运而生，开启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邮政的发展历史。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取得商（城）潢（川）战役胜利，改商城为赤城，商城县邮政局也更名为赤城县邮政局。

赤城县邮政局是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邮政通信机构，担负着鄂豫皖交界地区、苏区、白区邮政通信业务。邮政局下设7个邮政支局，配有邮戳、公章和统一的信布挂袋等，除担负发行报刊、邮寄信件、传递文件任务外，还要为20多个地下党组织传递信件和情报，对传播革命思想、弘扬先进文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推进苏区建设发挥了积极又重要的作用。

作用。

赤城县邮政局虽然建在苏区，但对外仍以药店为名，秘密开展邮递工作，所有红军指战员到邮局寄递家书，都要先“买药”、对暗号。传递信件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对于苏区与白区地下党组织之间的信件，一般由交通员经过化装秘密专送，很多信件都是放在衣服、帽子、鞋子的夹层里，或者搓成很细的纸捻子缠到绳子里进行传递；重要的、特殊的信件除采取秘密方式传递外，还要派武装人员进行护送。

赤城县邮政局从局长到工作人员都是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他们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秉承着“人在信在，完成任务”的信念，为完成特殊使命，作出了巨大牺牲。邮政局的三任局长都被敌军杀害，一大批通信人员在执行任务中英勇献身。

小通信员胡小五就是其中一员。在一次送信过程中，他被敌人拦住。狡猾的敌人发现了胡小五藏在袜底的信件，就用刺刀逼迫他带路去寻找红军队伍。胡小五带着敌人在山里转了一整天，最后在一处悬崖边，趁其不备，抓住一个敌人的皮带，纵身跳下悬崖与其同归于尽。

赤城县邮政局自1930年春建立，到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撤出大别山结束，

